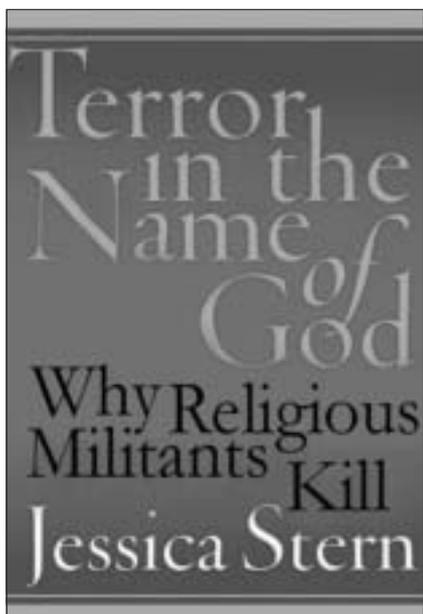


他們即是在以「永恆的施主」的聲音裝腔作勢，以「不犯錯誤的人代替上帝」(頁44)的神話在法國不停地上演着。他們與其說是啟蒙，毋寧說是蠱惑；與其說是指點江山的「教育」，毋寧說是誤導方向的「歧

路燈」。要改變這種給歷史塞途布障的情形，要將知識份子從「老牛掉到枯井裏」的困境中拉出來，請允許筆者套用鄧恩的一句名言：先生(自然也包括「陛下」您)，請讓他人做您忠實的反對黨吧！

誰在製造暴力？

● 馬建福



Jessica Stern, *Terror in the Name of God: Why Religious Militants Kill* (New York: Ecco, 2003).

《以上帝之名的恐怖：宗教狂熱者為何屠戮？》(*Terror in the Name of God: Why Religious Militants Kill*，以下簡稱《恐怖》，引用只註頁碼)一書，是作者斯特恩(Jessica Stern)冒着各種風險，深入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極端份子的活動基地，從其經濟狀況、政治意圖、心理特徵以及宗教訴求諸方面展開調查和分析而最終成型的力作。作者是研究恐怖與反恐怖主義的專家，現任職於美國哈佛大學；近年來因為研究恐怖主義，同時以其著作頗豐、視角獨特而為學界關注。斯特恩曾在1994至1995年效力於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政府，同時為許多國家和地區打擊恐怖主義的措施建言獻策。該書是她的成名作。

在作者看來，恐怖行為不是穆斯林極端份子專有的，因為不管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各種宗教信徒都有過形式各異的過激行為。這些過激行為都有關身份與認同的探求。

* 本文的部分分析借鑒Anthony Stahelski, "Book Review: Terror in the Name of God: Why Religious Militants Kill", *Cultic Studies Review* 5, no. 1 (2006): 146-52. 在此註明並致以謝意。

恐怖份子的行為，除了仇恨，就是對於世俗化、全球化、西方後殖民行徑的恐懼反應。他們時時打算用自己的行動來維護內心的神聖，報復對一切變化的不適應。宗教，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主義，是各種武力行為實施的後盾。

該書的核心內容在其結論部分有所表達：當下世間一系列恐怖行為隨着全球化向縱深發展，隨着國際新秩序的演變將大行其道，大肆蔓延。而且，隨着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交融並錯，生活在邊緣的人，受中心控制的人，將會不斷地用各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失落，他們的被遺忘。不僅如此，他們還會從被指使的被動和各種以犧牲為基礎的方式來「回報」扶持他們的中心勢力（頁294-95）。《恐怖》一書，雖然不是人類學著作，但是作者所採取的深入實地訪談方法，多少借鑒了人類學之田野調查方法，通過與研究對象面對面的訪談而最終成文。筆者選擇讀這本書，原因有二：一是當前人類學研究恐怖行為時，以此為必讀之書，二是這本書與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緊密相關，特別是進入2008年，中國國內出現的一系列襲擊事件，敦促筆者去讀這本書，在此做一評述。

斯特恩開宗明義，講述寫作這本書的來龍去脈，同時交代了調查過程中遇到的各種艱難險阻。不管是有所渲染，還是作者的真情抒發，都會給讀者以一種閱讀的刺激和快感，產生要讀下去讀明白的欲望。她在前言部分說：研究恐怖主義多年，但是一直想着深入進去，以互動的方式獲取第一手數據的想法讓我一直蠢蠢欲動（頁xiii）。同時，在伊斯蘭教及穆斯林成為「千夫指」之時，她不想人云亦云地跟隨大流。在她看來，恐怖行為不是穆斯林極端份子專有的，因為不管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各種宗教信徒都有過形式各異的過激行

為。另外，這種普遍性的現象在向我們表明，其實這些過激行為都是源自一個問題：我們是誰？這是一個有關身份與認同的探求。認同的失落令他們產生一種被羞辱的感覺。這種被羞辱可以是個體的受損、集體的遭殃，也可以是整體的被凌辱。

接着，斯特恩對「九一一」事件帶來的影響做了分析。「九一一」事件，的確讓人很心傷，也讓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很生氣，讓世界各國感覺到事態嚴重。受害者每每談及，有些人為此傷心欲絕，有些人痛心疾首，更多人看到那些後期展現的材料和鏡頭會不寒而慄，當然也有人迄今還在質疑和尋找事件的真正兇手。在各種謎團依然朦朧之時，不同學派學科的人，對這件事採取了不同的態度，他們希望用自己的知識，建構和實踐一種理解和分析潮流，其實都是話語的祭奠、積澱和極點。斯特恩則用了自己的方式表達上述三層意思。

時至今日，「九一一」事件已經過去了七年之久，這個令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悲劇給人們留下了許多疑問。其中一個是，此事件的行動者為甚麼要用自己的生命換取對別人的暴力？是甚麼樣的動力讓他們膽敢殃及無辜平民？這種行為的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些人認為這是純粹的癡狂行為，是動物本能之殘暴性、失去人性的反常表現，是一種瘋狂而過頭的報復行動。其實，稍微關注和了解宗教的人，一般都能夠從中找到答案。因為，人們的行為往往是依附於宗教

這塊土壤，同時又附加着某種寄託的行為。仇恨也是這種土壤中之種子。當然，世界巨大，各種宗教信仰大相逕庭，各具特點，也不可一概而論，不過從中探索普遍規律，或者說進行異同比較，也不失為一種策略。斯特恩就做到了這一點。

雖然世人還沒有拿出百分百的證據來證實此次事件為拉登 (Osama bin Laden) 所為，但是他和基地 (Al-Qaeda，又譯阿爾蓋達) 組織所建立的網絡關係，特別是美國這位「繫鈴者」的行動之事實現在已經大白於天下。這些人的行為，除了仇恨，還有一層就是對於世俗化、全球化、西方後殖民行徑的恐懼反應。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擴張、世俗化的加速、現代性的失範和後現代性的左顧右盼之際，讓他們時時打算用自己的行動來維護內心的神聖，報復對一切變化的不適應。宗教，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主義（並非伊斯蘭教所專有，任何宗教都以此阻止宗教的過多改革），是各種武力行為實施的後盾。以原教旨主義為基礎的行動，在他們看來只不過是對「骯髒地球」一年一度的清洗，為了一個乾淨純潔的宗教環境而對他者藏污納垢之地的清潔而已。

斯特恩親赴不同宗教軍事組織的基地，深入其中，洞悉了不同組織採取殘暴行為的動力之源。令人值得玩味的是，無論哪種宗教，何種組織，其領導者都有「英雄所見略同」的共識：他們的行為是絕對值得稱道的高尚行為。他們面臨的不是同一敵人，可是他們對敵人的概念和懲戒模式卻是出奇地相似：

總歸有個邪惡組織需要被摧毀。但是，就恐怖勢力而言，他們各有理解。斯特恩的看法是，邪惡來自傷痕。當來自外在的傷害過於慘重時，受害人無法忍受，以至於難以控制情緒，而且這種情緒讓他／她只有借助更加殘忍的手段來「彌補」自己的缺失（頁176）。這些人遭受的苦痛，在他們別無選擇時，只能以牙還牙，只好睚眦必報，以更為兇狠的軍事手段來挑戰專制、強權和霸道。斯特恩以巴勒斯坦危機為例，用了大量篇幅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全面的論證。

巴勒斯坦人因為對以色列人的憤懣，同時對這些「撒旦」的霸道行為無能為力，他們只能在絕望中最後一搏，以期絕處逢生。正是這些仇恨，迫使巴勒斯坦武裝組織（西方集團命名為「恐怖份子」），如哈馬斯 (HAMAS) 鼓動、招募一些年輕氣盛的人加入，再經過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包括心靈、肉體方面的訓練，讓他們慢慢達到一種忘我之心理境地，無畏且心甘情願用自己的肉體捆綁炸彈，讓以色列人血債血還，同時換回自己前世的壯烈與後世的永恆。在《恐怖》一書中，斯特恩寫道：這些恐怖份子頭目有意借用宗教經典中犧牲的實例給這些「無畏」的人灌輸獻身的偉大與神聖，認為這種行為不僅僅偉大、神聖，而且能實現「兩世吉慶」。因此，獻身以換取後世的樂園與養主的喜悅，便成為各種離奇行為的原動力（頁147-48）。

過去，恐怖份子都是一些不經世事的「盲流」，或者說是一些飢寒交迫、唯求以獻生命來換取家人生

無論哪種宗教，何種組織，其領導者都有「英雄所見略同」的共識：他們的行為是絕對值得稱道的高尚行為。他們面臨的不是同一敵人，可是他們對敵人的概念和懲戒模式卻是出奇地相似：總歸有個邪惡組織需要被摧毀。

完全以宗教來分析恐怖行為是對宗教的一種有意的玷污，恐怖份子只不過是打着宗教的幌子來滿足他們殘暴的欲望。深入分析恐怖份子的內在心理可能更為有效，更能緩和因為暴力而導致的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間的陌生與疏遠。

活保障的有責任心的人(有點像中國歷史上揭竿而起的農民)，而現在其中也不乏受過高等教育者，而且出身於豪門貴族者亦有之。以基地組織為例，其中多數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出身中產階級，甚至還有美國青年選擇皈依，並為尋求「正義」而參與其中。不過，這種現象也並非普遍，因為大多數參與者還是因為窮途末路而無以為繼，已喪失生活之理想，只好靠「肉體獻祭」來換回心靈家園的安慰。據說哈馬斯組織就是以這樣的一個思維慣性來引導這些人實現理想的無畏(讓筆者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士兵用整架飛機撞擊美軍艦，讓所有美國人匪夷所思，直到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的文化模式之分析後，才茅塞頓開)。那今天的這種「恐怖行為」是甚麼呢？前面已經提及，就是「兩世吉慶」，前世存活者有了衣食保障，犧牲者「穿着血衣進天堂」，「舍黑德」。這點與張承志《心靈史》(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中蘇菲派哲赫忍耶的悲壯頗為相似。

哈馬斯的這種恐怖誘導是不是也是一種內力受外壓過度的一種絕望表達呢？斯特恩在調查過程中看到，愈來愈多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參與其中。過去，哈馬斯可能會通過說服、誘引等方式來招募成員，現在反而要進行挑選；並且參與恐怖行為在當前已經轉變為謀生的職業之一。參與者目的很明確，他們無

法用自己的身體和勞力贍養父母，生養子女，只要組織能答應讓他們的父母頤養天年或者給他們養老送終，讓自己的兒女成行，安然無恙，他們情願付出。他們認為這種付出，不是一種恥辱，而是一種榮耀，因為他們獲致的是「兩世吉慶」。當然這種方式並不僅僅屬於伊斯蘭教的，也是基督教思想，更是猶太教之締造。

在美國，斯特恩對另外一個群體進行了調查。這些人都是虔誠的基督教信徒，他們的主要攻擊對象是違背基督教教旨的人，尤其是那些從事墮胎手術的醫生。在這些人看來，他們「喪盡天良」，屠殺嬰兒，違背上帝的旨意，所以該殺。這些人以「救贖」為動力，通過熄滅原動力的方式來保護嬰兒，因為他們相信，依照《聖經》行事，他們殘酷的屠殺、屠戮根本不是恐怖行為，而是善舉。斯特恩在訪談中看到，這些人是以一種非常自豪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高尚行為，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根本沒有錯誤，他們是在救人之命。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恐怖活動背後的真相，斯特恩與猶太教恐怖集團的兩個核心人物布雷(Michael Bray)和希爾(Paul Hill)做了訪談。曾經以牧師為業的希爾認為，那些十惡不赦的墮胎醫師死有餘辜，他們在用鋒利的刀刃滅絕尚未見世的生命，可憐的孩子們，需要人來救他們。

這些宗教狂熱者，以挽救為目的，卻以殘暴凌駕他人生命之上，儘管他們對這種行為供認不諱，但

是他們還是並不為此而有罪惡感。他們認為這是對罪惡的一種復仇。與巴勒斯坦穆斯林的行為相比，其實殊途同歸，他們都打着宗教的幌子，企圖以更殘暴的手段來讓對方償還自己的犧牲。結果往往是出現更多的一連串打擊、報復和犧牲。恐怖行為，在每個宗教的教義中都有明確的定義和嚴格的限制，然而弔詭的是，恐怖份子常常以此來辯解，證明自己的神聖、自己的無辜、自己的與眾不同和大義凜然。

斯特恩對兩種以宗教為藉口的恐怖行為做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完全以宗教來分析恐怖行為是對宗教的一種有意的玷污，恐怖份子只不過是打着宗教的幌子來滿足他們殘暴的欲望。深入分析這些恐怖份子的內在心理可能更為有效，更能緩和因為暴力而導致的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間的陌生與疏遠。另外，在其他章節中，斯特恩也對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宗教組織如聖戰軍(Laskar Jihad)和虔誠軍(Lashkare Taiba)做了分析。斯特恩對他們的關注是因為，她可能從小道消息中得知他們與基地組織關係緊密。此外，還有個體復仇者看到暴力來臨，在劫難逃，只好以暴還暴。作者給我們分析了恐怖行為的新範式、新特點。有些人之所以濫殺無辜，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有責任這麼做，因為這都是「信仰的安排，上帝的要求，安拉的命令」(頁159)。

在斯特恩對各種帶有強烈恐怖和暴力氣味的事態做了詳實的分析

之後，她告誡世人，在不遠的將來，將會有更多打着宗教旗號的恐怖行為，而且遍及全球。為甚麼會如此猖狂？因為恐怖份子背後都有着一些勢力的支撐，這些勢力用心不良，圖謀不軌，在他國教唆誘使，培育反對勢力，在引起動蕩之後，收留這些人，給他們提供孳生毒瘤之地，以圖將來更大目的。他們故意在他國挑起事端，製造混亂，企圖漁翁得利。其實，作者或許是礙於面子，或許是因為還想保留美國公民的身份，因此沒有明顯指出，世界動亂的源頭不在動亂之地，而在西方、在美國，甚至可以說是在白宮裏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美國惡勢力以慣用的手段，讓他人家園戰火不斷，自己則從中牟取暴利。無論是一命嗚呼的薩達姆(Saddam Hussein)，還是今天無家可歸的拉登，都是美國霸權勢力染指他國的罪惡明證。他們哪裏料到，自己一手培育的芒種也會倒生，也會生芒，正所謂自食其果。

斯特恩最後寫道：那些流亡份子，在受到庇護到美國之後，在美國財團惡勢力的支持下，他們接受美國軍事訓練，獲贈最先進最殘暴的軍事設備，被把玩於股掌之中、被利用，不管是打着哪種宗教的幌子，其目的都是明顯的，那就是消滅資本主義的罪惡。宗教只不過是他們實現目的的一個憑藉，因為任何宗教的信徒都有慈悲為懷者，都有人面獸心者(頁185)。

《恐怖》一書，的確是一本非凡之作，斯特恩不僅駕馭文字如行雲

一戰後，美國惡勢力以慣用的手段，讓他人家園戰火不斷，自己則從中牟取暴利。無論是一命嗚呼的薩達姆，還是今天無家可歸的拉登，都是美國霸權勢力染指他國的罪惡明證。他們哪裏料到會自食其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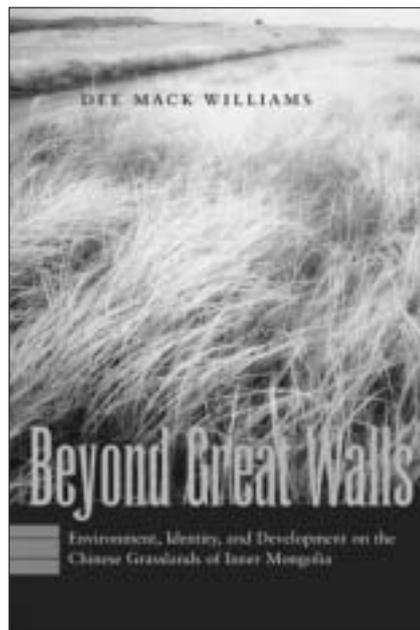
流水，調查研究更是獨闢蹊徑，「勇闖虎穴」，深入實地，與恐怖份子面對面地交流，真正從人之心理中挖掘，不僅讓讀者看到一個真實的恐怖面孔，同時穿透這種面孔，讓人看到了更加恐怖的骷髏——政治、經濟權力與權勢的操作者。如果要從整本書中，找到最讓筆者觸

動的話，應該是開場白中的那句話：宗教恐怖主義，來自內心的疼痛，來自喪失親人的悲憫，來自對養主「不公」的怒吼，也是對養主命定的一種絕望（頁10）。這種疼痛，在徹底絕望之後，這些受害者對這個強權、強勢集團所締造的兇暴世界作出了最後一搏。

揭開話語的面紗

● 張 雯

本書以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翁牛特旗的那什罕蘇木為例，研究1980年代以來的「去集體化」和經濟發展給草原牧區帶來的巨大變遷，以及政府機構、市場經濟、草原科學家、西方知識份子和當地牧民多種主體之間的互動關係。



Dee Mack Williams, *Beyond Great Walls: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Chines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威廉姆斯 (Dee Mack Williams) 2002年出版的《長城之外——中國內蒙古草原的環境、認同和發展》(*Beyond Great Walls: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Chines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以下簡稱《長城之外》，引用只註頁碼)，是近年來研究內蒙古環境和社會變遷較有影響的一部人類學著作。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賈科維雅克 (William Jankowiak) 高度評價此書：「這是民族志寫作和中國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體現出作者具有原創性的有力分析和高度說服力的理論主張，將為未來中國和世界的草原研究奠定一個新的基準。」(參見封底評論)

這本書以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翁牛特旗的那什罕蘇木為例，主要研究的是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的「去集體化」和經濟發展給草原牧區